

论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风格

孙彦彬，孙彦莊，张惠思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摘要

徐刚被誉为“环保作家”、“生态报告文学的先驱”，也是生态报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见证人。其生态文学有着极强的审美价值，为读者营造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自然生态画卷。他的生态报告文学的美学风格主要体现在主体亲历参与的真实美、叙事形式的诗意表达美。在结构上，徐刚运用新颖独特的结构框架配以适度的历史描写；在语言上，他使用了大量的科学语言，同时又辅以诗意的抒情语言，为枯燥的生态文学带来了美感。在叙述方面，他则运用宏大叙事法，既叙事结构的自由开放、全球化的叙事视野、深广的思想内涵以及跨文体的表达方式。过去，生态报告文学作家爱在作品中进行道德的呼吁以及现实的控诉，因此学者较少注重研究生态报告的文学艺术技巧，而这正是徐刚作品所具备的艺术特色。本文不仅探讨徐刚作品自然审美的鉴赏，还论及他如何从美学的向度和艺术技巧，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与法则。

关键词：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美学风格

The Style of Xu Gang's Ecological Reportage

SENG Yan Ping, SENG Yan Chuan and TEOH Hooi Se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Abstract

Xu Gang is considered as the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Writer”, “Pioneer of Ecological Reportage”, and also an important wit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portage. His ecological literature has a strong aesthetic value and creates poetic natural ecological picture for the reader. The aesthetic style of his ecological reportage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true beauty of the subjec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poetic expression of the narrative form. For the structure of his reportage, Xu Gang uses a new and unique structural framework with a moderate historical description; or the language, he uses a lot of scientific language, while supplemented by poetic lyric language, brings beauty to the boring ecological topics. For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narrative mode, he uses the grand narrative method, which is not only free and open in narrative structure, but also full of the narrative vision of globalization, the profound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cross-genre writing method. In the past, ecological reportage writers emphasized on the morality and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human towards environment, therefore, few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reportage. As Xu Gang's reportages have artistic skill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he conn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rom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and artistic skills.

Keywords: Xu Gang, ecological reportage, aesthetic style

一、前言

徐刚, 1945 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岛, 20 世纪 7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以诗歌成名, 现任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理事, 国家环保总局聘为“中国环境使者”等。1988 开始, 他被誉为“环保作家”、“生态报告文学的先驱”, 也是生态报告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见证人。他写出了大量震惊世人又易为世人传读的生态文学作品, 包括《伐木者, 醒来!》、《江河并非万古流》、《中国风沙线》、《中国, 另一种危机》、《世纪末的忧思》、《绿梦》、《倾听大地》、《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沉沦的国土》、《大山水》。其生态作品《守望大芦荡》、《森林写意》、《小草》、《小河》等分别被选入上海、北京的中学语文教材, 或补充教材, 及全国中专技校教材; 《中国风沙线》被选编入大学报告文学辅导教材; 《伐木者, 醒来!》被列入《绿色经典》文库。他的作品不仅数量丰富而且质量优良, 在历届优秀报告文学评选中均有所获。其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第四届冰心文学奖, 2010 年度“郭沫若散文奖”, 也曾获选“世界重大题材写作 500 位”之一。

徐刚选择创作生态报告文学, 是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和思想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引发生态危机, 造成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灾害频繁等。由于目睹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构成复杂的多面矛盾体, 经历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绿色思潮”, 是令徐刚走上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直接力量。因此, 绿色母题成为贯穿了徐刚整个创作生涯的一条主轴线。

徐刚的生态文学亦有着极强的审美价值, 无论是结构特征还是语言特征都显得与众不同。诗人出身的徐刚在叙述中坚持运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身边的自然生态之美, 为读者营造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自然生态画卷。他的生态报告文学的美学风格主要体现在自身亲历参与的真实美、叙事形式的诗意表达美, 并体现反思能力和丰富的人文精神。在结构上, 徐刚运用新颖独特的结构框架配以适度的历史描写, 插入了一些历史典故, 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 在语言上, 他使用了大量的科学语言, 无论是精准的数据还是权威的概念解释都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 同时又辅以诗意的抒情语言, 为枯燥的生态文学带来了美感。在叙述方面, 他运用宏大叙事法, 既叙事结构的自由开放、全球化的叙事视野、深广的思想内涵以及跨文体的写作方法。这些是他的独特风格, 值得研究。

自 1986 年开始, 徐刚在武夷山、天目山、海南、东北等地, 调查了大量与自然生态相关的事件和故事之后, 便出版了其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 醒来!》。他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了中国许多地方因大肆砍伐森林的行径, 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 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此作品发表后轰动全国, 引发众人的省思, 改变了人们对森林与自然的认识。这部作品, 标志着中国生态报告文学的崛起, 徐刚因此被称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他以《伐木者, 醒来!》为起点, 开始了长达 20 多的生态文学创作。在走遍名山大川, 探访荒漠、森林, 寻访江河湖泊的过程中, 徐刚目睹了森林的乱砍滥伐造成了土地沙化的迅速恶化、江河几近的枯竭。这些经历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因此, 徐刚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 不断写出很多生态作品以唤醒大众对生态恶化的关注。李青松说: “徐刚的可贵在于 20 年来他从未停步, 始终坚守着一种精神。他几乎成为生

态文学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李青松，2005，第11页)

徐刚的作品令人震撼及激发人们去思考生态危机，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在《世纪末的忧思》、《中国风沙线》及《守望家园》这几部作品中。在《世纪末的忧思》中，徐刚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视野来揭露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并一一分析国家所面对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农业落后、耕地锐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植被退化、物种锐减，煤、石油、矿石等资源的迅速递减、国民缺乏忧患意识等。《中国风沙线》则描述人民营建绵延几千公里的三北防护林之悲壮与艰酸，并展示了显得空阔、荒凉而忧郁的风沙线和干裂的土壤以及大漠戈壁。他不只写出杰出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品，也推动了中国生态报告文学以及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过去，大部分报告文学作者只展示问题现象层面，并没有深入到本质层面探寻其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根源。传统的报告文学仅具新闻性及文学性而已，而徐刚的创作法对生态文学进行了继承和创新，是80年代推动中国问题报告文学走向繁荣，被世人关注的原因之一。他以作品带领大家创作出具有文献性及学术性的作品，在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中去审视考察对象，加大了报告文学思想的容量与锋芒。生态报告文学亦是问题报告文学的其中一个分支，而徐刚则拓展和丰富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视域。

徐刚的作品有其重要的生态报告文学史价值。“问题报告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一种突出的报告文学文类，以现实报告为基本特征、以社会批判为重要价值取向。作家应具有强烈的社会担当意识，承担着社会的和艺术的双重任务。根据丁晓原：“作家的自主性正在生成，写作由屈从于某种号令的被动态，变为作家参与现实的一种主动方式，由一种代言人式的社论体制作，变为具有个人风格的有意味的创作。”(丁晓原，2001，第116页)

他的创作新观念为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带来很大的影响，激发从事生态写作的作家有关文学素质问题的思考：报告文学需要作家深入了解所描写的对象，对生态常识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有关徐刚的成就及贡献，李炳银给予高度的肯定，认为徐刚对于人类生存状况和前途命运的审视考察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局限，他博大的胸怀给予人类直接的抚慰和终极的关怀，他的一系列有关生态环保内容的作品，不仅在其所涉及的生活领域和蕴涵的情感和思考方面具有意义，而且在开拓中国文学的审视对象和表现内容及文学形态的创新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李炳银，2003，第214页)在内容方面，徐刚在对生态问题的揭露中体现了新思想，令当时的问题报告文学具有了较强的知识性和批判性。他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观察世界的新方式，令大家在思辨中获取启迪、反省和彻悟。在形式方面，他的创作形态有变化，艺术手法也多样，提升了中国问题报告文学的艺术性。

有关徐刚在问题报告文学内容方面的拓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对生态主题的把握不落窠臼。徐刚致力于关怀生态危机的各个方面，挖掘与众不同的线索，重审“人与自然”的关系。多年来他创作了脱颖而出的《绿色宣言》、《中国，另一种危机》、《守望家园》、《伐木者，醒来!》等一系列作品，在主题上突破了传统生态文学主题的狭隘性，在内容方面展现了现实价值。其长篇系列《守望家园》(徐刚，1997b&1997c)是最佳实例。此书荣获中国图书奖、中国环境文

学奖、地球奖。这部 70 余万字的作品描写了海洋、土地、江河、森林、动物、宇宙, 被韩作荣认作是关于环境问题的“百科全书”。“(作者)以广博、细微的爱渗透于文字之间, 使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内蕴与姿态, 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小百科全书’。(呼延华, 1998 年 7 月 22 日)

二、宏观综合法

在创作手法方面, 徐刚的宏观综合与学术品格拓宽了报告文学的艺术视野, 丰富了报告文学的表现方法, 改变了报告文学的传统观念。过去, 报告文学记事、写人, 并被限制于一人一事的书写, 一味地展示问题, 稍显乏味, 而徐刚的创新写作手法使报告文学从狭隘的角度向宏观综合空间的转换, 用理性的自觉和理性思辨的力度, 加强文化批判的理性, 反映和思考社会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依照章罗生的理论, 报告文学“宏观综合”主要是指该作品在时间上纵贯古今, 在空间上横览四方, 站在较高的视点,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 以尽可能多的人物和事例来证明观点、说明问题; 其“学术品格”, 一是指这种方法所体现的论证方式与思辨色彩, 二是指作品因信息的密集、资料的众多所体现的“资料性”和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所体现的“知识性”。(章罗生, 2005, 第 88 页)

过去数十年, 中国生态报告文学主题可分为: 自然灾害、水资源枯竭、森林砍伐、捕杀野生动物等。如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及王治安的《悲壮的森林》披露森林砍伐所带来的问题; 刘贤贵的《中国水污染》及马役军的《中国水危机》揭示水污染导致的生态危机; 李存葆的《鲸殇》及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揭发人类残酷捕杀野生动物的行径。这些作品表现出基本的生态批判意识, 但却止步于生态危机的现象表述, 没有对生态问题背后的历史、社会及文化原因进一步探索, 令生态报告文学缺乏深厚的主题意蕴和审美内涵, 缺乏冲击力。徐刚在这方面突破了他们的局限, 创作了大量全方位、高品位的生态报告文学, 为以后进入虚构性生态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具有“题材的公共性、内容的警示性与主题的人类性”(罗宗宇, 2002, 第 40 页)。对生态家园的忧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 令徐刚将视野深入到历史的空间, 获得了“宏观综合”报告文学的著称。

《中国风沙线》文中, 每当叙述到一个地方的生态问题时, 徐刚往往就会深入追溯该地区的生态历史。例如对祁连山森林植被的历史状况的叙述, 让读者充分地了解祁连山是如何从林深草密退化为如今的风沙遍地的荒地。“西行路上左公柳”一节中作者满怀深情地追忆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时, 沿途栽种柳树的壮举, 既让我们充分地感知先人保护生态环境的悲壮努力, 又对我们自己当前肆意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羞惭不已。当然, 徐刚这种恢宏壮阔的生态视野的根基是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

在《大山水》中, 徐刚描述了距今一百多万年前的森林、冰川之历史:

100 多万年前, 第四纪行将到来。这时古大陆解体, 较小的陆块在移动中下沉, 而古海被年轻洋壳取代的不可思议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海底的平均

高度增加，大陆板块与海洋环境一系列变化的共同作用下，大规模的海侵开始。然后是北半球气温明显下降，冰川大规模发育，大大小小的冰盖形成，全球气候变冷已是大势所趋。（徐刚，2007，第12页）

《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仲冬之月，冰益坚，地如析。”西汉《韩诗外传》称：“凡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独六出。“……唐玄奘师徒去印度取经，于公元前630年左右途经天山木扎尔特冰川，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描述极为生动：“其山险峭，峻极于天，子开辟以来，冰雪所覆，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徐刚，2007，第14页）

作者通过大自然的历史传递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严密关注，表露对人类与万类万物家园被工业文明发展吞噬的深深忧虑，宣扬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作家要给予善良的人们的警示。他利用一切机会告诉人们：一旦缺水和水污染的灾难同时降临，所带来的灾难将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曾面对过的任何巨大劫难。缺少粮食可以用一季一季的丰收弥补，缺少石油可以找别的能源替代，谁能想象，一旦出现水的灾难，人类将如何生存繁衍？没有水的文化，中华民族决不可能有绵延不绝的发展。（陈金陵，2008，第8页）

《地球传》则是以地球为对象，描述其生成、发展以及演变的过程。比如：“在追思自然、倾听远古时，人类就能感悟到历史从黑暗深处幽微中闪烁的初始震颤：地球来之不易！”在这部作品中，徐刚讲述了由这个伟大天体所衍生的一切事物，包括非洲大裂谷、哥伦布、达芬奇古生代海洋、恐龙时代、中国冰川、飘移大陆……他以古生代的海洋到恐龙时代的繁盛，从第四纪的地球动荡漂移到古希腊人对南北极的臆测，将历史融入到对地球家园的关怀中。形式上，他以历史和传说相互穿插在作品中，让读者感受人类的进化与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让人们在历史中体会人类的文化转变，强调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却负面地对地球造成严重的毁灭性。徐刚的作品总是常引据史料，横贯中西，有着厚重的历史感。

徐刚在《守望家园》中，将“家园”的概念扩展到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徐刚是在超越了民族国家，政治文化，宗教信仰，地理环境等等的局限之后，反思人类，访寻自然，恸问苍冥，看护家园。此作品的恢弘大气，是徐刚生态文学创作历程中“巅峰”状态的产物。文中不仅含有考古学、地理学、宇宙学、天文学、地质学、海洋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作者还针对世界上各方面的生态景观及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探测。在报告地球生态圈的构成和正在遭到毁坏情形时，徐刚不惜篇幅引用理论和数据，加以大量分析论说，令作品除了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外，还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识。评论家李炳银认为，“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对现实的人类世界进行了认真和冷峻的解剖和描写，用大量使人震惊的事实报告了地球生态平衡遭到人为破坏，人类生存环境出现的严重危机。因此，它的纪实内容足以让每一个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人受到有力的震撼。（李炳银，2003，第214页）

《长江传》罗列了大量的历史、地理、水利及人文等的资料和数据，详尽地显现出长江的今昔之比，追念长江过去的辉煌，感叹今日长江之窘境。在长达

50 万字的《中国：另一种危机》中，徐刚则全面性及系统性地揭示了中国的生态危机作品，除了揭露土地沙漠化等问题外，还刻画了水与空气的污染、披露森林砍伐与捕杀稀有动物的恶行等。相较一般生态作者只是提出现象，徐刚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失衡”问题导致的社会危机，包括人口暴涨但质量下降等问题，并探讨了文化教育问题以及国民素养问题等。这两部作品显示出徐刚对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的终极关怀和深切忧患。

三、时间和空间的跨度

除了以恢宏壮阔的生态视野，以及厚重历史感展开叙述，徐刚也重视报告文学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他由生态与环保问题开始转向对中华各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探询，将历史与地理及文化相互融合。他不只是纯粹进入历史，而是把人类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演变及变迁做进一步的描述。他通过历史的纵横交错的比照，以及探寻历史足迹的过程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活水源头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自然与人文的相互映衬与相互交融，从而在人类学的意义上深刻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明特质。《大山水》和《伏羲传》是其中两部最佳实例。

《大山水》中，徐刚查阅了古代文献有关山水冰雪的记载，刻画了亚欧大陆上最宏伟的山脉河流：从帕米尔山脉到青藏高原的座座高山，附生其间分别奔流入太平洋、印度洋的条条河流。还回顾了亿万年来这些高山、陆地、江河的现状及其后所发生的演变，又描写了数千年来这里的居民，包括汉、藏、怒、傈僳、珞巴、羯、羌各个民族部落形成的过程以及其历史变迁。其重点不是对青藏高原上高山大川的悉心刻画，也不是描写自然景观的美丽，而是在于揭示这里的大山大河与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中华儿女的密切联系，包括培植了各民族的性格，孕育了形态各异而又可以交融的文化。通过呈现山水流变对人文积淀的深远影响，融入了各民族的历史和文明。

中国有报告文学作家把取材的视线投向史海，捕捉一些具有报告价值的史料进行创作，那些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徐刚则不然，他的《伏羲传》是引述神话人物让读者：探求真切的神奇信息，尽可能全面、丰富地感知和享受未曾经验过的美感。此篇作品是徐刚考察大地湾后的作品。他到大地湾探访，只因传说中伏羲出生在水天。考古学家 80 年代在水天秦安縣挖出一個遺址，是属于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大地湾遗址，也正是徐刚到访的地方。虽然作品题目是《伏羲传》，但徐刚并不仅为伏羲写传，而是宏观地探讨远古史，既 6000 千多年前此地中华始祖的踪迹。他以详确的各种史料、考古发现、文物器件和田野调查，对这位中华始祖的行迹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演。通过丰沛的想象，他试图复原远古人类祖先的活动行迹和劳动的场景，让读者了解并认识伏羲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文明的艰苦繁过程，以及原初中华文明所蕴涵的文化遗传基因。

孙德喜认为：“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中，徐刚以他的大手笔描绘了中华民族始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原始文化，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追溯到最初的渊源。徐刚的这些作品无疑具有其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意义。”（孙德喜，2011，第 221 页）徐刚根据历史资料对伏羲作出准确的定位。在写

作过程中, 徐刚并没有将伏羲当作某个具体的人物来书写, 而是突出了他的符号性与象征性, 还有艺术性。这种创新手法令徐刚的作品可填补某一史料的空白, 又有文学的艺术感染力, 让读者从中领悟历史和人生的真谛。

徐刚在《江河并非万古流》中所关注的空间范围也极其恢宏, 江河湖泊包括长江、黄河、海河、滦河、漳河、拒马河、珠江、淮河、松花江、辽河、苏州河、黄浦江、京杭大运河、微山湖、太湖、洞庭湖、西湖、鄱阳湖、月牙泉、大渡河、玄武湖等地, 进而探讨有关水的问题。《中国风沙线》更是气势磅礴, 作者跋涉于大西北漫长的风沙线上, 跨越大半个中国长达7000多公里的范围, 从东北、内蒙古到贺兰山、古浪、凉州, 再到戈壁城民勤、金昌、祁连山、张掖、敦煌等多个地域观察风沙侵蚀的状况。他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地展示出这些大范围的生态问题, 取代了单一事件或人物的单线型叙述。徐刚的这些报告文学每涉及一个生态环境问题, 就总要把这个问题放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背景上来打量, 尽可能充分地占有材料, 游目四顾, 挥斥方遒, 意气轩昂。(汪树东, 2008, 第16页)

有关徐刚的学术品格, 在《伐木者, 醒来!》明显可见。作者先从罗马俱乐部告诫人类, 对人类发展困境的警告入手, 然后悲愤地详述了亲眼目睹中国各地区均因为人类的乱砍滥伐给森林资源带来的破坏, 导致土地越来越严重的沙漠化。笔触涉猎到黑龙江、内蒙古、福建、浙江、新疆、青海、海南、湖南、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和大兴安岭、武夷山、天目山、泰山、雁荡山、黄山、五指山等多座名山。作者写福建武夷山的滥砍滥伐, 着力描写陈建霖保护森林的片段; 叙述浙江天目山获得良好保护, 与武夷山人破坏森林的情况有着强烈的对比。更让作者失望的是黄河连年水患, 起因乃富饶的温州人大肆占地毁林造坟。作者以俯视过去的角度, 将历史注入当代人的视野, 因此此文中尚有涉及美国19世纪对森林的破坏和20世纪对森林的保护的历史, 其中还穿插了信息量丰富的资料及大量的调查数据。

在《世纪末的忧思》作品中则是有大量的具体数字。他以论证方式与思辨色彩来提高知识及学术性。这几部作品的呈现, 说明他经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及严谨的统计, 然后将科学精准的事实和数字说服读者。作品以问题或思考点作为统领中心, 以实证性的素材和立体化的思辩, 构架了报告文学特有的理论思考空间。这一切强化了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及批判功能, 令他的作品震惊了读者。这显示出徐刚的作品符合了李运抟对报告文学的价值观: “必须看到学术意识使得报告文学增强了理性与说服力, 而且成为现代报告文学自觉的文体意识。”(李运抟, 2013, 第14页)

四、艺术性

徐刚的报告文学除了具知识性、现实性及历史性外, 也具有醇厚的艺术性。他有很强的语言驾驭能力, 创作手法属于跨文类写作, 借鉴了诗歌及散文笔法书写报告文学, 作品具内蕴深邃的美学风格。根据蔡洞峰“作为诗性作家, 徐刚的情感体验是用心灵去感悟自然和大地的存在。这一点, 与其说是一种修辞手法,

倒不如说是作者在向读者表明他对地球家园的一种诗意态度……面对自然, 作者常处于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蔡洞峰, 2015, 第 25 页)。徐刚报告文学中的诗意表达由几个方面组成: 语言的诗化、修辞的运用与情感的渲染。他也因而常以敏锐的感官, 细腻的观察来描摹大自然的诗意, 例如在《守望家园》的《荒漠呼告》中, 他如此描写:

月牙泉畔, 月光下的沙丘模糊地显示着它的轮廓和绵长的框架, 夜空是碧蓝的, 沙乡是黑暗的, 碧蓝之下的黑暗有深邃感你可以去想象……远方, 祁连山的冰川雪峰仍然是冰冷的雪白的, 只是由夜的黑色幕帷笼罩了, 让辉煌暂时沉寂。幕帷上爬着梦, 有的像蝴蝶, 有的像紫罗兰。……戈壁都是大地的一部分, 那戈壁滩上的乱石已经沉思默想几百万年乃至几千万年了, 它只是一种存在, 它没有梦, 如果你捡起一块戈壁石, 你会发现它毫无尘垢, 你得, 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 那不是人的排列。(徐刚, 1997b, 第 355 页)

文中徐刚对诗性自然的素描, 呈现出生态自然的色彩与景象, 使读者犹如身历其境。文字上, 作者以简洁精练的文笔描写月牙泉与鸣沙山, 既有娓娓道来的平淡, 也有色彩中带来的绚丽, 给人一种清爽利落的气息。“诗意”, 意在促使作者发现生活的诗意, 并进行诗意的审美表达以强化报告文学的审美功能。(刘白羽, 1998, 第118页)

无论是海浪、湖泊、山河、树木、鸟虫等的描写, 都能引发徐刚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思考, 以及双方生存危机的顾虑。作者在作品中往往结合图象叙事与文字叙事, 以诗的语言来突显报告语言的激情和张力。就如徐刚作品中以多种绿色与“绿”字描述作品中的大自然: 嫩绿、翠绿、墨绿、绿叶、绿地、绿洲、青藤等。这不仅让读者有视觉之感, 在某一程度上也是在建构一种摧毁前的美好, 使文章更具有张力。徐刚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绿色的情感纽带”, 这情感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 对生灵万物的体贴, 对人类社会前途的忧虑, 对宇宙间生态平衡秩序和和谐的祈盼。(鲁枢元, 2000, 第 96 页)

作为诗性作家, 徐刚的情感体验是用心灵去感悟自然和大地的存在。因此, 徐刚用一种“倾听大地”的诗性语言来表达对自然和大地的依恋和敬畏。(蔡洞峰, 2015, 第 25页)在作品中, 徐刚常常以比拟手法表现万物生灵的内心与心声, 书写了大自然欲说不能的痛苦。如“海洋呻吟”、“人是树的枝节”、“长江母亲, 你说, 你说……”、“地球累了”、“长江已失去耐心”等。作者将自然人格化的叙述方式也是一种诗意。徐刚诗人般的想象与感悟, 使其作品中的生态有一种生生不息的气息, 成为诗意的泉源。就如作者描写的长江:

她是天造地设的, 她是大地母亲的形象的流动, 她负有使命从而具有明确的方向和高程, 她的奔突万里舍身而下是一种怎样的启迪啊! 长江把源头隐匿在西部冰山雪峰的怀抱里, 她不乏山的阳刚之气却又浸润着冰雪柔情, 是圣洁和庄严的至善至美。雪的重叠, 冰的凝固, 亿万年后奇迹出现了: 冰清玉洁, 波涛万里。(徐刚, 2004, 第 265 页)

作者把自己同化进长江之中, 从各个视角写下长江的美, 以诗人的想象与感悟, 写出长江生生不息的精神, 形成独特的意境, 也令读者能重新看待这历史悠久的

自然生态。

另外，徐刚笔下的风也成了调皮活力的形象：

那是绿色的风，不是大漠黄风。（徐刚，2005a，第192页）

有一个梦里我遇见风，那是遥远年代的童稚黄口的小风，如树叶一样垂挂着，与布谷鸟嬉戏，在芦苇的长叶上吹动着露珠儿，拂去沟边地头野菊花的灰尘，晃动着田野里的油菜花把芳香驮上蜜蜂的翅膀。（徐刚，2005a，第192页）

在作品中，徐刚常常以拟人手法表现万物生灵的内心与心声，书写了大自然欲说不能的痛苦。由于他的作品被列为代表作，令人耳熟能详的是：“海洋呻吟”、“人是树的枝节”、“长江母亲，你说，你说……”、“地球累了”、“长江已失去耐心”等。比如在《伐木者，醒来！》中，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出人类难以破除的愚痴：“在散发封建气息的土地上，无知和愚昧交成了一道坚实的篱笆。”（徐刚，1997a，第38页）作者虽深知人类的愚痴根深蒂固，但其倡导生态保护的心却不因此而退缩。此外，徐刚也擅于以比喻书写大自然，如《地球传》中的：“地球是摇篮，地球是以海洋的庄严妙相、深邃广大为摇篮的。”（徐刚，2009，第168页）地球是人类的摇篮，这与长江是人类的母亲，自然孕育人类万物的道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作者在作品中透过拟人化与比喻手法，反思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他相信人与自然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人类对自然的所作所为，最终也将会回归到自己的身上。

报告文学中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并重，使作家的现代意识能够通过文学的情感渲染有效地影响现实世界。面对生态问题，徐刚往往以内心的真实情感，唤起人们对生态保护的忧患意识。在《沉沦的国土》中，徐刚通过批判人类对待大自然的丑恶面貌，对被严重性破坏的大自然表达了深切的忧心：

绿色文明的毁灭，大体上经历两个过程：先是人类的掠夺性破坏，而后是沙漠的最后吞噬。人被沙漠赶着走。在这被沙漠追赶的过程中，人格日益矮化，环境日益恶劣，绝望是沙漠中最可怕的遗传基因。（徐刚，2005b，第148页）

另外，作者在《伐木者，醒来！》中描述了中国大多数森林被滥伐林木的现状。生态的失衡造成了当地居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对此，他在文中通过预警的口吻，引发读者对生态危机的忧虑和对人自身破坏环境的反思（蔡洞峰，2015，第24页）：“人不可能占有一切。人的狂妄、自私与愚昧如果不是因为大自然的及时的惩罚而稍有挫折的话，人类毁灭自己的速度将会更快！”（徐刚，1997a，第48页）《伐木者，醒来！》的结尾，作者发出了对人们原始真心的呼唤：“我仍要在地球上放号——无论我的声音是多么细小——伐木者，醒来”。（徐刚，1997a，第85页）作者悉知自己的声音在现实中乃渺小的力量，却还是希望自己的呐喊能通过现象的展现，引起人们理性的反思。

在《伐木者，醒来！》中，徐刚以红色来表达他对人类无知与贪婪的愤怒情

感：“使中国人看见了一个如此巨大鲜明的红色的警告”（徐刚，1997a，第39页）。作者以“红”作为“危险”的符号，把1987年5月大兴安岭的火灾化作大自然对人类的预警。然而，徐刚不同于其他仅会一味的愤怒和呐喊的生态报告文学作家，而是往往以一种深深的忧伤表达其深刻的批判：

长江岸边的芦苇荡，尤其在下流的江滩上，是特色独具的。它并不粗壮却耐水耐风自有纤纤风骨，而且芦根纵横交错，繁殖极快。笔者从小与芦苇结伴度过了清苦而富于想象的童年……。（徐刚，1997a，第55页）

我不禁想起了芦叶船伴我度过的孩提时代。这一只载走了我最初想像的绿色小船，还会属于现代和以后的江南水乡的孩子们吗？（徐刚，1997a，第55页）

童年的回忆让作者对长江多了一分情感。文中，作者以细致的文笔对过往的长江堤岸进行描述，流露出他对此地的眷恋情感。文中的反问不仅是他对生态的担忧，也是为了“吹起预言的号角，唤醒沉睡的人类。”（徐刚，2005b，第148页）在《世纪末的忧思》中，作者也以哀伤代替愤怒：

当岁月穿过世纪末的峡谷。时光之箭从来是毫不犹豫的。你的皮肤皱了，我的头发白了。象征‘皇基永固’的故宫衰老了，又有一处万里长城的旧址倒塌了，西山顶上的石头也被磨损了。（徐刚，2011，第70页）

这篇作品中，作者以“皮肤皱了，头发白了”来描绘大自然逝去的荒寂与萧索，渲染出淡淡的诗意。然而，作者在情感的渲染后并没有一味沉溺在他的悲痛中。在哀伤之后，徐刚也在作品中寄予他对人类与大自然的期盼：“总有一天为着树木和森林的再生，为着正义和良知的胜利，为着伐木者的醒来，我们干杯！”（徐刚，1997a，第18页）。

徐刚对一个生态环境问题展开空间上全方位追踪的同时，也充分地展开对历史的追溯，更以全球观念及人类视角，运用宏观综合法，开创了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方向。新近考古发现的引进，给作品增添了某种新闻的意义，从而赋予了作品报告文学的特性。作品富含生态伦理观，海量的生态信息、宏大的叙事结构、以及诗意化的言语表达，是他生态报告文学独特的审美诉求。他把美学带进报告文学中，散文化及诗意语言不仅令读者感动，还从而唤醒大家的生态意识。

参考文献

- 蔡洞峰（2015）。〈徐刚生态报告文学的绿色情怀与美学风格〉。《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4（4），23-26。
- 陈金陵（2008年6月11日）。〈著名作家徐刚，以大山水的名义〉。《中国环境报》，8。
- 丁晓原（2001）。《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上海：三联书店。
- 呼延华（1998年7月22日）。〈徐刚和《守望家园》〉。《中华读书报》。取自 <http://www.gmw.cn/01ds/1998-07/22/GB/208%5EDS1316.htm>
- 李炳银（2003）。〈守望与呐喊——读徐刚《守望家园》〉。《中国报告文学的世纪景观》。武昌：长江文艺出版社。
- 李青松（2005）。〈生态文学勿要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的恢复和重建〉。《自然之友》，（3）。
- 李运抟（2013年4月23日）。〈强化报告文学的学术意识〉。《光明日报》，14。
- 刘白羽（1998）。〈再论报告文学〉。《刘白羽文集》（第五卷）。北京：华艺出版社。
- 鲁枢元（2000）。《生态文艺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 罗宗宇（2002）。〈对生态危机的艺术报告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简论〉。《文艺理论与批评》，（6），36-42。
- 孙德喜（2011）。〈在边缘地带探索——论徐刚近年的报告文学〉。《中国作家》，6，220-224。
- 汪树东（2008）。〈守望大地：生态意识与徐刚的生态文学〉。《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4（2），15-19。
- 徐刚（1997a）。《伐木者，醒来！》。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 徐刚（1997b）。《守望家园》（上卷）。长沙：湖南科技技术出版社。
- 徐刚（1997c）。《守望家园》（下卷）。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徐刚（2004）。《我将飘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徐刚（2005a）。〈倾听大地〉。《沉沦的国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徐刚（2005b）。《沉沦的国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徐刚（2007）。《大山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徐刚（2009）。《地球传》。北京：作家出版社。

徐刚（2011）。〈世纪末的忧思〉。《大地备忘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章罗生（2005）。〈论问题报告文学—中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一〉。《中国文学研究》，（1），85-90。